



## 老相机记录延安峥嵘岁月

张哲浩 王建平

一部老相机，时隔70多年，又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部相机最初的主人是中国摄影大师吴印咸，2019年由一位名叫杜群的96岁老人捐赠给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这部相机曾经注视过70多年前延安的山山水水，包括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生动场面，记录下了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留下无数抗日军民的身影，它定格的历史瞬间和自身的故事融入了新中国70年的国家记忆。

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但极度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摄影器材。同年，吴印咸应邀赴延安拍摄一部反映延安与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生产生活的纪录片。动身前，吴印咸倾其所有购买了三部二手照相机：一部120相机、两部135相机，这三部相机成为电影团在延安时期的主要摄影器材。

初到延安的吴印咸用他手头的135相机定



吴印咸在延安使用的135相机。(视频截图)

格了不少精彩瞬间。尽管生活很艰苦，但吴印咸被当时延安朴素积极的氛围深深感染，他透过镜头捕捉到延安处处洋溢着的乐观与坚定。

后来，其中一部135相机被拆散用于制作图片放大机，另一部135相机，也就是杜群老人捐赠的这部相机，承担了大量的拍摄工作。

马似友是吴印咸的主要助手，参与了《延安与八路军》等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延安电影团后期，因这部135相机日渐陈旧，不再用于电影拍摄，其间曾作为摄影训练班的教具使用，由指导员马似友保管。

1945年底，马似友和电影团出发赴东北新区，妻子杜群同行并参与到日常工作中。1946年6月，马似友一路操劳，身体虚弱，行至安东时染上斑疹伤寒，没几天病情急剧恶化，最终宣告不治。杜群失去心爱的丈夫，心力交瘁，还忙于照顾刚刚出生的女儿，丈夫留下的东西只好全

部由电影团的同志们帮忙匆匆收拾。

到达长春之后，杜群离队到地方工作。待安定下来整理行李时，她才发现了这部135照相机，这也成为马似友留下的唯一遗物，亦成为她的精神寄托。由于当时电影团已行至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建立东北电影制片厂，联络困难，杜群只好将这部相机珍藏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女儿马临清出嫁时，杜群把这部135相机交给女儿，以安慰女儿的思父之情。马临清于2000年病逝，这部相机就由马临清的女儿张玲一直珍藏……

这部普通的照相机经过三代人的珍藏、三代人的情感寄托，历经70余载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变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如今，它再次回到延安，向人们默默地讲述着延安电影人的初心，时刻牢记我党电影和摄影事业的光辉历程。



清“乾隆旅行文具箱”(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珍藏有一件“乾隆旅行文具箱”，这是一套紫檀箱装形式的组合文具，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设计巧妙，所放文具数量达60余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实用品和艺术品。

旅行文具箱，长74厘米，宽29厘米，高14厘米，箱底和箱盖各高7厘米。四角嵌黄色鎏金的铜角，用来防止其在旅途中受到磕碰与磨损。木箱的外壁、底、盖都用合叶连接。箱盖装有镀金暗锁，钥匙孔设在箱底。箱体全用紫檀木为之，可开合，展开为桌，合闭为箱。桌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铜鎏金暗扣固定。

箱内设计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各异的多宝格，可以放置64件小巧精细的文房四宝及文杂器具，如白玉洗、松花江石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每件器具都有固定的位置，器格按其形状大小而特制，严丝合缝。

此文具箱将多种文房器具装于一箱内，随时随地都可打开作为炕桌，用以题诗赋词、处理政务、对弈论棋以及欣赏书画。据造办处档案记载，此套文具桌箱制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箱设计精巧，最适宜外出旅行使用，为清代乾隆时期文房器具中的杰作。



“乾隆旅行文具箱”打开展示图

## U型路与“三揖三让”

林吉

在陕西扶风县云塘村西云塘墓址考古现场，考古工作者发现有条路是U型的。这样一条路实际上是一个行“三揖三让”礼的区域，关系到中国古代的礼制，也就是周礼。

“三揖三让”是古代的一种宗庙迎宾之礼，后也用于日常。主人三揖、宾客回以三让，分为“将进揖”、“当陈揖”、“当揖揖”、“将进揖”就是将要进门的时候，主人和宾客要先“揖让”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分开以后拐弯，两个人都朝向了北，这时候又要见面了，再行“揖让”之礼后继续再往北走；走到中庭的地方有一座碑，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碑处主人和客人再“揖让”，一个“三揖三让”的礼仪即告完成。

早在3000多年前，周人就确立了完备的“五礼”，其中的一些内容如“冠婚之事嘉礼”等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



## 垣曲秤砣反映宋代盐法变革

宋代计量器具“垣曲县店下样”，国家一级文物，运城市垣曲县博物馆馆藏。

“垣曲县店下样”是一青石质八棱形秤砣。上部方形，中有圆穿孔，1958年运城市垣曲县东滩村修建水渠时意外发现。砣体八棱柱，每面阴刻盐样约文，楷书，端首刻石为名曰“垣曲县店下样”，空白处线刻缠枝花叶和荷花纹。凿刻精工，计量准确，约文周密，为宋代盐运的重要量器，对河东经济史研究具有特殊价值，也是中国盐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物。

“店下样”整体保存完好，重140公斤，通体高47.3厘米。“店下样”的铭文共38行，每行6至8字，共计293字，其中个别字漫漶不清。

王泽庆、吕辑书、柴继光、郭正忠等学者据宋代文献、石砣铭文和石砣缺损处的残迹考订，对“垣曲县店下样”的来龙去脉得出了结论——“垣曲县店下样”的置立，是宋代盐法变革的产物。

在宋代，食盐的官卖、商销，起初没有统一的制度，由产销盐地所在的各州、郡自行其是。宋天圣八年(1030)，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王随谏言，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时任兵部员外郎的范祥制定“盐钞法”，对盐的运销办法进行重大变革。它先在运城盐池施行，后逐渐通行全国。“垣曲县店下样”置立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由盐商出面与众商议，设置“盐样”放在运盐通道的安邑、含口、垣曲三个处所。



宋垣曲县店下样(垣曲县博物馆藏)

“垣曲县店下样”的出土告诉我们，11世纪后，期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活跃着几支合法的商人运输队。他们雇佣车夫运盐，签署契约，制造商民用标准权衡，制定赏罚标准等社会经济手段，维持和调解着盐商、车夫、雇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商人所组织的潞盐运输队为国内交通线路的更新和食盐运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运城新闻网

## 小店元墓 壁画神妙

冀晓峰 常一民 李丹

在我市小店区，有一座元代墓葬，其中的壁画生动传神。

2015年3月至5月，文物考古人员在配合太原市刚玉五一生活区建设工作中，抢救性发掘了三座元代墓葬，并对其中一座壁画墓进行搬迁。发掘的三座墓葬平面均呈多边形，壁画施仿木斗拱、仿木椽飞和瓦顶，在太原地区，这种墓葬结构多见于宋至元代墓葬。三座墓葬形式大同小异，很可能是一个家族墓群。

1号墓室壁画保存较为完整。在甬道及墓室直壁、仿木砖雕部分刷白灰水，形成白灰层后直接作画。仿木斗拱用黑、绿、红、蓝颜料施彩。拱眼用红、绿颜料绘花果，可惜图案大多已经模糊不清，可辨识的只有鸡冠花、柿子、牡丹、莲花灯。仿木普柏柳绘黑地褐彩回纹。其下仿木阑额两端箍头施以墨线白描的如意云纹，中部枋心饰褐彩木纹。八面墓壁除南壁用黑色留白的回纹饰于甬道口，其余面皆绘黑色边框，彩绘壁画绘于其中。

西南壁绘一男仆，头戴红色镀笠冠，着灰色左衽窄袖长袍，足蹬红色靴，双手执于胸前，右前臂搭白色长巾。蒙古人认为帽子和头颅同等重要，“二人行，长者为上；一人行，帽子为上”，所以元代服饰中比较重要的便是帽冠。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说：“蒙古官民皆带(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所谓“楼子”，指的大概就是笠，是一种圆檐斗笠形帽，形状像钹，所以叫“钹笠冠”。男仆所戴钹笠冠，为元代帽式中常见的一种，据说这类帽本来无前檐，后来忽必烈射猎时感到日光刺眼，察必皇后特意给加了前檐，从此蒙古族便都戴这种有圆檐、或前圆后方式的帽子了，尤其贵族最为喜爱这种帽子。

东南壁绘一女仆，头盘三发髻，上束丝带，身穿灰色右衽短袖长袍，着灰色靴，手捧捧盒。

## 陶寺青铜建鼓座

方鸿

8月下旬，《我为青山主——傅山专题展》在太原市博物馆开展，共展出105件傅山精品书画和善本古籍等文物。近因疫情暂时闭馆，兹介绍其中精品，以飨读者。

——编者

## 傅山“公揭”书正气

《通省诸生公揭》(亦名《山西通省诸生上各部院公呈稿》)为一代文宗傅山先生高风亮节、急公好义的体现。

《通省诸生公揭》卷，源自于著名历史事件“伏阙诉冤”。明崇祯九年(1636)十月，傅山先生的恩师袁继咸遭诬陷进京接受勘问，山西四府诸生陆续赴京诉冤，当时正值壮年的傅山先生亦率领百余名学生徒步进京为恩师鸣冤，举国震惊，先生也由此名闻天下。明崇祯十年(1637)正月、二月间，诸生每夜往朝房门外候阁老投揭。在这一过程中，傅山起草《山西通省诸生上各部院公呈稿》，又由丁时学修饰合式，列诸生名百余余人。在众人的努力下，同年闰四月，袁继咸终得昭雪。

《通省诸生公揭》为楷书手卷，纵22.8厘米，横120.5厘米，其中“为公保清正学臣，以端风教事，生等伏睹本省提学道袁秉乾事，气骨嶙峋，文章炳蔚，其教士也，首明道德……至于本官禔躬，一介不染，三公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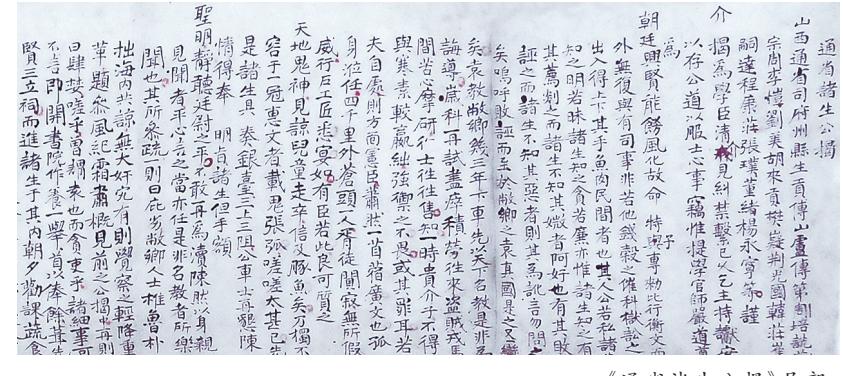
履行考试，明而且公……为朝廷明公道，为士民留人心”等句，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体现了傅山先生反对黑暗暴政的决心。

傅山先生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光明皎洁的人格以及忠贞不渝的气节，体现在楷书作品中则是流丽整洁、典雅优雅，一派中和典雅的气象。

此卷以古朴扎实的风格，遒劲凝重的笔力，生动自然的章法，鲜明地体现出傅山先生高尚情怀。在明末清初的书坛独领风骚，稳重厚实，自然洒脱，朴实含蓄中达到了大巧若拙、含而不露的艺术境界。这不仅是傅山“人书合一”的真实写照，更可以说是其书法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意识的生动体现。

从此卷中，可以领悟傅山思想学术中蕴含的精神品质，感悟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激励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上砥砺奋进。

太原市博物馆供稿



《通省诸生公揭》局部

## 丁村人牙化石

狄跟飞

丁村遗址，1953年发现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丁村，是一个扩及汾河两岸由旧石器早中期多个地点组成的遗址群，其中以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最为著名。

十多万年前丁村人生活在汾河中、下游一带温暖湿润的疏林草原环境之中。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着狼、狐狸、大象、犀牛、野马、羚羊以及各类动物；汾河的水量比现在大得多，幽深的河中游弋着鱼、蟹、虾、蟹。原始群居的丁村人使用打制石器，仰赖大自然的恩赐，过着以渔猎为主兼营采集的经济生活。

丁村遗址自发现以来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发掘。1954年首次调查发掘历时52天，这次发掘地点主要集中在汾河东岸的第三阶地上，发现有石器及动物化石地点14个，获得2005件石制品，28种哺乳动物化石和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分别是右上颤内侧门齿、右上颤外侧门齿和右下颤第二臼齿。根据三颗牙齿的大小、形状、颜色、磨耗程度以及出土时的距离判断，它们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个体，其齿冠和齿根的尺寸比北京人的同型牙齿细小，右下颤第二臼



发现于襄汾县丁村遗址的丁村人牙齿

齿咬合面的磨耗比现代人复杂得多，但在许多细节上与现代人接近，因此可以判定，丁村人应该是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而丁村人的门齿呈铲形，有明显的齿面隆突和指状突。

铲形门齿在元谋人、北京人、许家窑人等众多古人类化石以及现代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牙齿上都具备这样的特征，体现了亚洲黄种人较为一致的体质特征和遗传性状。丁村人的铲形门齿特征为中国古人类的延续进化写上了鲜明的一笔。

## 陶寺青铜建鼓座

方鸿

建鼓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礼仪乐器，在古人心目中，其具有“沟通天地人神”的深刻内涵，常用于宗教祭祀活动，有时也用于军队作战，用以指挥军队进退。建鼓座用于承插建鼓柱，稳定建鼓，由鼓座、楹杆、鼓体三部分组成，楹杆、鼓体大多为木质和皮革，不易保存，考古出土一般只剩鼓座。

2017年襄汾陶寺北墓地M3011出土一件青铜蟠龙建鼓座，底径84.5厘米，器身最大径90.5厘米，通高44.2厘米，重达58.8千克，是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的青铜鼓座，时代为春秋晚期。

鼓座主体由三条蟠龙相互缠绕盘旋而成，龙身满饰细密的蟠螭纹，龙首昂起，嘴衔承楹柱的圆筒，颈部有鳞纹、折线纹。下部有圆形底座，饰有饕餮纹、蟠螭纹，并有对称的4个铺首衔环。

青铜蟠龙建鼓座结构精巧，沉稳厚重，纹饰精美，是春秋晚期晋国高超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建鼓一般只发现在高等级墓葬中，彰显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和地位，同时这件大体量的青铜鼓座，也是晋霸春秋的实物见证。



青铜蟠龙建鼓座(山西博物院藏)



壁画细节(上)及墓室内景(下)